

# 复旦大学获校友一次性捐赠 10 亿元

这些高校也曾获该级别校友捐赠

■ 本报记者 皮磊

据复旦大学微信公众号 4 月 23 日消息,复旦大学建校 120 周年来临之际,复旦大学材料系高分子专业 1985 级校友李平、历史学系 1986 级校友廖梅夫妇决定为母校一次性捐赠 10 亿元,支持建设复旦大学敏高等研究院。

文章称,学敏高等研究院定位为世界顶尖的自然科学领域高水平基础研究和交叉研究机构,以交叉性、前沿性、国际化为建设宗旨,致力成为世界顶尖的科技创新策源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贡献复旦力量。

该研究院面向全球招募博士毕业五年以内、国际最顶尖的青年科学家,支持青年科学家开展原创突破性、技术革命性和具有深远影响力的研究工作,努力作出颠覆传统认知、解决重大难题或创建新学科范式的研究成果,推动社会跨越式发展。

对于此次捐赠,廖梅表示,“我们希望为学校捐助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应该还是比较困难的——在学术上有挑战性,需要花费很

久时间,需要很多财力支持,但是会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的社会责任。”

文章显示,从复旦大学本科毕业后,李平投身商界,是宁德时代联合创始人。廖梅在复旦读了十年书,是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教授指导的第一位国内博士生。

据《公益时报》编制发布的中国慈善榜分析显示,近年来,校友捐赠已成为目前国内高校获得社会捐赠的重要来源,校友及校友企业在支持高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产学研结合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校友捐赠在金额及规模上不断创造新的历史记录,引发行业关注;另一方面,校友捐赠也呈现出持续时间长、互动性强等显著特征。

据不完全统计,除了此次复旦大学获校友 10 亿元巨额捐赠,近五年来也有几笔金额在 10 亿元级别的校友捐赠,且都引发了舆论密切关注。

如,2021 年 3 月 3 日北京大学发布消息称,北京大学名誉校友、中公教育集团董事长、1995



复旦大学校园远景图

级校友李永新及其创建的北京中公公益基金会捐资 10 亿元,设立北京大学中公教育发展基金,全面支持北大学科建设、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等各方面的发展。北京大学方面发布的消息显示,该笔捐赠是截至 2021 年北京大学建校以来收获的最大一笔个人捐赠,也是最大一笔校友捐赠。此前,李永新累计向北京大学捐赠 11.8 亿元。

2021 年 8 月 22 日,武汉大学校友陈东升携泰康保险集团

向武汉大学捐赠 10 亿元,该笔捐赠也成为当时武汉大学校史上获得的最大一笔捐赠,也是我国大学医学、生命科学学科领域数额最大的捐赠之一。资料显示,陈东升 1979 年考入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自 1997 年至此次捐赠之前,陈东升曾 19 次为母校发展科教事业捐资,累计捐赠总额超 2.9 亿元。

不过,在 2023 年,该笔大额捐赠纪录被同为武汉大学校友的雷军打破——2023 年 11 月,武汉

大学 1987 级计算机系校友,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向母校捐赠 13 亿元。此次捐赠主要聚焦三个方向:支持数理文史哲六大学科基础研究、支持计算机领域科技创新、支持大学生培养。该笔捐赠刷新了武汉大学建校以来单笔最大捐赠纪录,也是全国高校迄今收到的最大一笔校友个人现金捐赠。

在 2023 年最后一天,浙江大学杰出校友段永平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进行了总额超 10 亿元的捐赠,主要用于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师生文体活动等方面,支持学校“双一流”建设。公开报道显示,自 2006 年起,段永平就一直在浙大建设发展的各个关键阶段进行多次捐赠,同时他还陆续设立了多个项目,包括“等额配比基金”“贷学金”“奖学金”“奖教金”以及“人才引进基金”等。此外,他还捐赠支持浙大图书馆基础馆、教学楼和信电学院大楼等建设项目,拨款用于生命科学交叉中心和文体中心等设施的建设。

(上接 08 版)

“事实上,能够存活下来,容纳一定的人群就业,在某些细分领域实现技术革新与突破,本身就是企业给社会带来的最大贡献,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绝佳彰显。”杨维东表示,公益慈善行动也并非仅是现金捐赠,工具箱可结合企业业务特点灵活多样,这方面浙江确实创新不断。

2024 年,杭州骋风而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向浙江大学捐赠算力服务,开创了国内高等教育领域新质生产力捐赠的先河。

“以前企业慈善捐赠跟自身业务分布的比较开,好像一个纯粹的外部事务。”杨方方也观测到了这个现象,“但现在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讲公益慈善与自身业务融合。”

慈善内部化,是杨方方提到的关键词。

她以阿里巴巴公益平台、支付宝公益平台为例表示,越来越

多的企业既是捐赠人,也是慈善资源的链接者、慈善土壤的夯实者,甚至还会成为公益慈善发展的引领者,并且影响员工、消费者和市场,直接改变慈善行业基础设施情况。另一种情况则是以“杭州六小龙”为代表的新兴企业,他们最好的公益模式便是根据自身技术优势,观测慈善缺口。

“与商业结合得非常紧密的探索性慈善创新,或许能够引领慈善未来。”杨方方说,“在未来的慈善事业发展中,‘慈’这一饱含力量不对等的词汇或许会越来越被提到,而‘善’则会跟更多系统链接,善技术、善企业、善经济……”

当下的浙江,这一观点正在被一个个多元实践所验证,构成“善行浙江”的多面。

## 技术:赋能发展

围绕“善技术”,苏家铭列举

了很多他亲身推进并发生在浙江的应用场景:

杭州民政开创性做了中国第一个用 VR 模拟阿尔兹海默老人体验的内容;浙江养老板块创新性地使用 VR 技术,让老人足不出户感受周边养老机构情况;联合蚂蚁集团蓝马甲公益行动,让网友用 VR 感受“老年人用手机为什么这么难”。

公益行动与企业技术、业务相融合的思考并非新兴企业的专利。

在杭州萧山,由谢家、径游、安山三村与传化集团共建的乡村振兴示范项目“谢径安·传化农创村”引发关注,通过“政企村农”联动模式,该农创村聚焦生物种业、数字农业等产业方向,打造农业科创平台,在乡村文化与社会发展方面,项目还通过成立村级公益基金会、全民艺术学堂等举措激活乡村文化活力。

值得关注的是,在“谢径安·

传化农创村”,传化的员工以产业公司技术员、基金会工作人员等身份同在地老乡站在一起,围绕乡村振兴牢牢扎根乡土,开展一场庞大的社会实验,以寻找乡土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

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企业繁衍在中华文明土壤上,有一股韧劲、闯劲和不服输的精神,这在老一辈企业家身上得到体现,在新一代企业家身上更加充分体现。”

据浙江本地媒体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4 年 3 月底,浙江省“万企兴万村”行动共有 3945 家企业(商会)结对帮扶 3527 个村,项目投资总额 308.42 亿元,到位资金 188.15 亿元,村集体增收 12.31 亿元;共建成定向招工式“共富工坊”1895 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近 10 万人,其中低收入农户 12903 人。

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浙江

企业扎根乡村的切实践,并展现出一个又一个围绕乡村振兴开展创新公益的模式与路线。

采访中,杨方方向记者展示了一份正在进行的围绕现代慈善全景中企业角色的研究,其中列举了一个慈善资源配置层级与企业角色适配的模型,浙江企业是其中的研究样本。杨方方写道,当企业都成为善企业时,慈善组织的功能将被企业所覆盖,慈善事业或许不再是一项独立事业。“慈善”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善念将无处不在,这样的社会或许进入了更高阶的文明状态,正如尤努斯教授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一个没有慈善和福利,也没有贫困的世界”。

杨维东对未来也有期待,他相信,在老牌互联网企业和新兴企业的共同推动下,浙江的公益慈善或将激起新的涟漪。(实习生任斯诺对本文亦有贡献)



一起反思  
别让污染侵蚀我们的家园